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 / 姚君喜著.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1
ISBN 7-5421-1011-X

Ⅰ. 甘. . . Ⅱ. 姚. . . Ⅲ. 传播媒介-关系-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甘肃省-2002-2003 Ⅳ. ①G206.2②D67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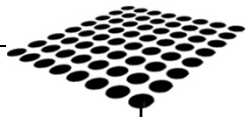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546 号

书　　名：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
作　　者：姚君喜　著
责任编辑：刘新田　贾海燕
封面设计：宋武征
出　　版：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甘肃方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0　插页：2
字　　数：287 千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 7-5421-1011-X
定　　价：26.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电话：0931-8773261(编辑部)
0931-8773262(发行部) 联系人：杨昀　E-mail：yangyun65535@163.com]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把目光投向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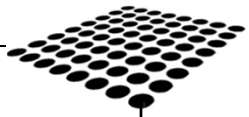
“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是由我的博士后指导老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张国良教授主持的国家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课题的子项目之一。可以说，本课题研究的缘起，是我的学术研究方向由美学向传播学的进一步拓展和纵深化。而伴随研究过程始终的，则是我对家乡甘肃这片热土的挚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心灵震撼。当然，本书的完成，也算是我对家乡社会经济建设所尽的一点绵薄之力吧！

2001 年 6 月，我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为以前一直从事的美学研究距离现实问题较远的缘故，我特别想更多地思考和关注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此外，我也想涉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以便进一步扩大知识结构和拓展研究视野，同时也通过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知识的学习，掌握不同的研究方法。这诸多原因，促成了我的博士后研究的转向。因我硕士阶段的传播学背景，加之对大众文化传播领域的强烈关注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自然而然，我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传播学。于是，我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提交了我的博士后研究申请，并详细介绍了我的研究思路和想法。这些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专家指导委员会的首肯，随后同意接收我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并安排我师从我国著名传播学者张国良教授学习和研究。此时，张老师作为国家教育部文科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正承担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一些基本构想、研究思路和方法等问题，初步计划把甘肃省分项目的研究任务交给我来完成，并鼓励我首先要大量阅读传播学经典著作，特别要尽快掌握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争取在传播学研究中有所

成就。这样，我对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也就开始了。

“中国发展传播学”课题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调查问卷的设计和样本的选择。在张老师的指导下，课题组首先确定了 9 个省、市、区作为一级样本。当课题组成员一起讨论确定一级样本的时候，大家反复选择比较，最后，无论是大家的感性认识，还是实际的 GDP 统计数据资料的显示，甘肃省自然作为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样本了。按照张老师最初的设想，同时结合我的地缘优势，课题组把本部分的调查和研究任务交给了我，由我负责组织完成。接到这项任务后，心里既高兴但又不是滋味。出于感情的偏向，我热爱我的家乡，心里一直不愿意承认家乡落后。我常想，贫穷落后，不应该是家乡的代名词；沙漠黄土，不应该是家乡永久的图腾！但摆在面前的现实确乎如此，甘肃作为全国传播学研究贫困地区的样本这一事实不可改变。事实上，落后贫穷不仅仅是我的家乡甘肃的现状，更是我们中国广大西部地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作为科学研究，本应持有一种客观的、中立的态度，不应该有偏私的、感情用事的方式。但因我所从事的这一课题研究的特殊性，就很难摆脱个人的情感倾向。我心里时常被这种情感所刺疼、折磨，久久难以释怀。因此可以说，本课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学术与情感的双重驱动下进行和完成的。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也痛心地看到这一幕幕的景象：贫困山区没有通电，没有电视、广播，甚至连报纸也很少见，遑论电脑、网络！走进偏僻的山村，作为现代化通信工具的手机也没有了信号，和外界失去了基本的联系。在光线阴暗的乡村小学的土坯教室中，孩子们除了正常使用的课本外，没有其他任何课外读物。很多被调查的农民不识字，读不懂调查问卷，不会填写，要访员们一一解释才能搞清楚。有些农民张着大嘴愣了半天，不知道我们现今的国家领导人是谁。通过调查，我们也进一步获得了一组组更为严峻的数据，例如：甘肃贫困地区的定西，“忠实”的报纸读者仅有 26%，远远低于全省 50%的平均水平，从不阅读报纸的人竟达到 40%。彩色电视机在发达地区已成为很普通的家庭消费品，有的城市家庭至少拥有 2 台，而定西地区的普及率仅为 66%。对下一步最想拥有的日常生活用品的选择，甘肃受众首选彩色电视



机，电视机竟然还是最先希望拥有的奢侈品。再如，甘肃受众与网络的接触，目前极不密切和频繁。其总接触率仅为 22%，“忠实”的网民仅为 6%，从不接触网络的人竟达到 78%。作为甘肃贫困地区的定西，对网络的接触率极度偏低，总接触率仅为 16%，“忠实”网民仅为 3%。

我们明确认识到，虽然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和信息文化的需求十分强烈和突出，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直接制约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和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当发达地区已进入信息时代，在奢侈地使用着网络，全球各地的人们穿越高山大洋的地理阻隔，自由地交流着数字化存在的时候，他们却依然面向黄土寻找着自己的归宿。所有这些，似乎都给我们警示，这是信息严重短缺的地区。光秃秃的黄土山峁和沟壑，似乎在无声地呼喊着：信息！信息！显然，信息极度短缺，使得贫困落后地区的文化明显和外界有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现实的经济贫困首先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处在现代生活的边缘。而更为严重的是，贫困导致的文化信息贫困，真正使他们游离于这个现代社会之外，使他们成为文化的被动接受者，成为文化的弱势群体。信息贫困才真正使他们“边缘化”，这是一个非常可悲和可怕的现实。而更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伴随着发达地区每一次现代化的飞跃，则一次比一次更快地把贫困地区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这一现实是否真正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情形并不使人乐观。可以这样说，我们现阶段的传播学研究对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关注真是太少了，我们应该把目光应投向这些弱势群体，投向大地。在研究中，我更多体会到的是，以甘肃为代表的中国西部广大的贫困落后地区，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转型期。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精神生活又处于边缘化状态，文化认识和价值观念也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真空状态。那么，这时的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公器”的性质就应突显出来。因此，就此看来，我们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真是太多了，而这些现实问题又必须要我们去思考、去解决。我常常想，什么是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关注什么？当我们的一些学者口口声声西方、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句不离“后现代”时，当我们生吞活剥西方的某些理论时，我们是否考虑到这些理论存在的现实土壤？一句话，我们的目光是否投向了大地？那一片滋养着我们华夏文化的热土，那让我们眼中常含泪水的祖国大地？

当然，对我来说，这项研究的完成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也许，永远就没有结束，一个学者的宿命就是永远地走下去，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回顾在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经历，可能将永远改变了我。三年来，我内心的撞击和变化是巨大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不属于学术研究的问题，只是个人情感问题。但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自由独立精神，除了向人的心灵深处探寻外，更应该关注我们脚下的大地。那里，才是我们的文化和心灵的真正滋养之所，真正的文化之根。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找到真正属于民族的自我精神！

序

张国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尽管面临各种问题，但诚如邓小平所言，“发展是硬道理”，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坚持不懈地为人民谋利益、为大众求发展，则任何困难、危机都可望破解，如“非典”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与此同时，无数经验和教训还昭示我们：发展务必尊重客观规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法则的引入，才带来国民经济的跳跃式增长，这可以说是最为有力的明证。而最近对于科学观的倡导，以及协调发展的思考和部署，同样体现了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独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就传播领域的情况看，一方面，有从业人员的努力探索，另一方面，则有研究人员的辛勤劳作。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应该说，我们对传播规律的了解和运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为：传播媒介的竞争能力、工作成效空前地加强了、改善了，而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也显著地增多了、提高了。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与人民的期待、社会的需求相比，其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实践中的盲目性、研究中的滞后性仍屡见不鲜。

以研究为例，20 多年来，从欧美传入的传播科学在中国已普及，“媒介”、“受众”、“地球村”、“议题设置”等概念和观点已耳熟能详。但细究起来，真正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成果的，其实屈指可数。

这种状况，似乎并不限于传播学科，而普遍见诸于各个人文社会学科，乃至形成了国家发展的“瓶颈”之一。正因如此，中

央于世纪之交提出了繁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构想。作为其一环，教育部在全国成立了 100 多个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地位相当于理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赋予其为振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充当主力团队的重任。

在此背景下，作为全国传播学科惟一的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自 21 世纪初组建以来，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深入探求传播规律、切实推动媒介改革的研究项目。本人主持的“中国发展传播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项目，而君喜博士负责的“甘肃发展传播研究”则是它的一个子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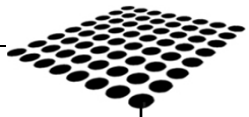
这一重大项目的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聚焦于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立足于本国现实问题，借鉴各国理论精华。此次调查中动员了 300 多名师生走出书斋，付出艰苦的劳动，在全国 9 省市的 25 个市县，进行了面向近 3000 名城乡受众的实地调查，并访问了 50 多个媒介机构，分析了 5000 多个版面的报纸内容。

由于工作量浩大，它目前尚未全部完成，但实际上，已经有一部分成果——君喜博士担当的这部书稿先行的、出色地完成了。我为此感到欣慰，并向君喜博士及其项目组全体成员深表谢意！

在我们选择的研究地点中，甘肃是西部西北地区的惟一代表。这不仅基于其在地理、人文、风物等方面的典型性，而且基于合作人才的可得性——由君喜博士这样优秀的研究人员担纲，项目品质方有可靠保障。

我相信，此书中的诸多数据、事实、分析和见解，将为甘肃传播业界、学界提供有益参考。同时我还希望，君喜博士把这一研究持续开展下去，为甘肃、为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学术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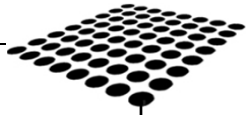
2004 年 11 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信息贫困与贫困文化 ……1
　第一节　信息化差距、信息贫困和贫困文化 ……1
　第二节　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化发展……12
第二章　社会发展与大众传播概况……20
　第一节　社会发展概况……21
　第二节　媒介发展状况……24
　第三节　主要问题与对策……28
第三章　大众传播受众抽样调查概况……35
　第一节　抽样调查概况……35
　第二节　调查对象的总体状况……37
第四章　受众对报纸的接触和评价……55
　第一节　概况……55
　第二节　接触内容和频率……61
　第三节　需求动机和满足程度……66
　第四节　总体评价……73
第五章　受众对电视的接触和评价……80
　第一节　概况……80
　第二节　接触内容和频率……85
　第三节　需求动机和满足程度……93
　第四节　总体评价……99
第六章　受众对广播的接触和评价…… 105
　第一节　概况…… 105
　第二节　接触内容和频率…… 111
　第三节　需求动机和满足程度…… 117
　第四节　总体评价…… 123

第七章　受众对网络的接触和评价…… 129
第一节　概况…… 129
第二节　上网的目的…… 135
第三节　网络的影响…… 137
第八章　受众对杂志及其他媒介的接触和评价…… 141
第一节　读杂志情况…… 141
第二节　读书情况…… 150
第三节　看录像(包括 VCD/DVD)情况…… 159
第四节　看电影情况…… 167
第九章　大众传播与受众的信息认知…… 171
第一节　概观…… 171
第二节　社会议程…… 179
第三节　传播效果…… 198
第十章　大众传播与受众的交往和观念…… 215
第一节　概况…… 215
第二节　决策行为…… 224
第三节　社会观念…… 230
第四节　具体观点及所受影响…… 246
第十一章　大众传播与文化观念的发展…… 257
第一节　概述…… 257
第二节　大众媒介与文化观念发展的关系…… 258
第三节　受众因素与文化观念的相关性分析…… 274
附录：国家发展与大众传播（调查问卷）…… 282
参考文献…… 306
后记…… 310



第一章　信息贫困与贫困文化

发展经济学先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于1969年发表了他的著作《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基于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事实性的把握，缪尔达尔选择了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原因，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缪尔达尔分析贫困的根源更多地涉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建构、宗教文化传统、人口及种族、教育等问题。他认为，通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通过现代化价值观的传播，通过发展中国家彻底的政治变革以及人民自身的努力，贫困问题可以得到克服。可见，他把人们的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看作是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从信息传播研究入手，着重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及对实现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社会全面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信息化差距、信息贫困和贫困文化

我们已明确认识到，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是我们目前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不管我们个人对这一趋势的态度如何，或是敞开胸怀去拥抱它的到来，或是紧闭心扉排斥它的干扰，这已是一个无法改变和回避的现实。身处后工业社会，任何个人、任何地区或是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被裹挟到这一发展大潮中去，这也几乎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甚至大多数普通大众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共识。我国要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必须要面对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也必须要主动去迎接它的挑战。但是，从世界范围内看，现实的发展并不令人乐观。信息化差距和信息贫困以及这些因素导致的贫困文化问题已成为信息社会制约地区、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贫困与反贫困：世界性难题

直至今天，贫困与反贫困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据联合国 1998 年的一份报告，今天世界上最富的 3 个人，其财富与世界上最穷的 48 个国家相当。而世界各国原本致力于维护公平所建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安全网”，却彻底地将更多的真正处于绝对贫困的百姓置于网外。世界贫困人口多了，而不是少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贫困是世界超级难题。全世界现有贫困人口 12 亿，占总人口的 20%。据估计，2000 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达 35 万亿美元。北美、欧共体和包括日本在内的 16 个发达国家的人口为 8.7 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5.58%；国民生产总值约有 25 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 70%。西方 7 个大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2%，国民生产总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 62.5%。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 50 年内，全球财富增长了 6 倍，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却越拉越大。占全球人口 20%的富人拥有世界财富的 75%，而占全球人口 20%的穷人人均每天不足 1 美元。少数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2 万美元，其中瑞士高达 3.6 万美元，人均每天 100 美元。而莫桑比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 80 美元，人均每天 0.2 美元。可是，即使在欧洲，也有 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欧盟 12 个成员国中便有 5000 万穷人，其中有 500 万人无家可归。他们终日挣扎在维持生命的贫困线上，被剥夺了住房权、医疗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家庭生活权。每四个比利时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下。1979 年—2000 年，英国人的平均工资增加了 35%，可是占人口 10%的穷人的工资竟然下降了 17%以上。2000 年美国有 3000 万人食品不足，处于程度不等的饥饿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在 3000 万食品不足的人当中，有 1200 多万是儿童；在 1200 万饥饿儿童中，6 岁以下的儿童占 600 万，他们营养不足、发育不良。在美

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378 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12.4%。另据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估计，美国每年约有 200 余万人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2000 年 4 月，美国有 700 万人无家可归，人数之多异乎寻常。导致美国穷人增多的原因很多，失业是其中之一。在美国 800 万个贫困家庭中，有 326 万个是失业家庭。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中，男性黑人劳动人口的失业率已经高达 40%~50%，这又同种族歧视有关。

我国贫困的比例不算很高。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现有贫困人口 4000 多万，由占世界贫困人口的 1/4 降低到 l/20。[①]研究者从城市和农村两大部分来分析贫困问题。

就我国城市的贫困问题看，专家认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过去的三年中贫困问题得到了政府、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经过多年研究，政府和学界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倾向于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在 1500 万左右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在中国政府的统计工作中没有作与贫困人口规模直接相关的统计分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大多是专家学者估算出来的，其间差异很大。2000 年—2001 年，亚洲发展银行组织了一批国内国外的专家共同进行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课题研究。在 2001 年 10 月举办的成果发布会上亚行专家组披露：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 1998 年的统计数据，专家们先用热量支出法和市场菜篮法测定各省的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然后再据此计算出全国的贫困人口，结论是 1480 万人。亚行专家组的测算是以城调队住户调查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的，运用的方法也是国际上常用的科学统计方法，因此，应该说这个研究结论是目前最科学也最有权威意义的数据。

关于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与需求，从 1998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对上海、天津、武汉、兰州和重庆等 5 个城市 2500 户贫困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这 5 个城市贫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见表 1-1。与调查当年的社会平均水平相比，上海、兰州和重庆相对比例较高。但是，要说明的是，上海、天津、武汉 3 市的数据是 1999 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以前的。按

① 周毅. 西部反贫困研究.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10~11）

30%的调整幅度计算，调整后上海达到了 40%左右，而武汉和天津与兰州和重庆差不多，也是 27%上下。同时，与国际公认的贫困线应为社会平均收入的 50%~60%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他们的收入可以说是仍然只够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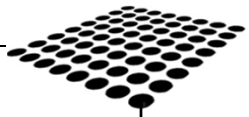
表 1-1　　五大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

	上海	武汉	天津	兰州	重庆
调查时间	1998.12	1999.7	1999.7	1999.10	1999.10
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	243	108	135	114	139
当地社会人均月收入	731	521	643	427	486
相当于当地人均月收入	31%	21%	21%	27%	28%

收入低下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来说，教育费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据上述调查，5 个城市贫困家庭负担不起学校学杂费的要占 60%~90%，有 50%~80%的家庭在教育方面没有能够享受到政府或学校的优惠。因为缺钱想让孩子退学的贫困家庭，除了上海还较少（7%）以外，其他城市都在 20%左右。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到了人们的社交等活动。城市贫困家庭中有 30%~40%不爱和邻居及同事交往，40%~60%过年过节不走亲访友。社交活动多少要花点钱，同时也因贫困而自鄙，这是贫困家庭疏于社交的主要原因。

关于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首先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2001 年 10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的白皮书中公布，有“3000 万人”、“占农村总人口比例的 3%左右”。如表 1-2 所示，中国农村扶贫的标准显然是以“贫困县”标准为主的。在 2000 年“八七”攻坚计划完成时，贫困标准调整为 625 元。[①]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2003 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1763 万人，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 60.8%；农村低收入人口 2946 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 52.4%；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合计为 4709 万人，占全国同类人口的

① 国务院新闻国办公室.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 中国扶贫网，2001. 6. 19



55.3%。2003 年中部地区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增加 35.4 万人，西部地区减少 24.7 万人。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增加。 至 2003 年底，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省有云南、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和四川。西部省份中除重庆、四川外，各省区扶贫重点县的贫困发生率均超过 10%。到 2003 年底，扶贫重点县农村低收入人口在 300 万以上的有河南、贵州、云南、甘肃；低收入人口比重在 20%以上的有黑龙江、甘肃、宁夏，10%以下的有河北、内蒙、湖北、四川。显然，作为我们研究个案的甘肃省，无论是从绝对贫困人口还是从低收入者看，都属于西部较突出和典型的地区。

表 1-2　　全国贫困县的数目和比例

东部		中部		西部	
总数	77	总数	149	总数	366
%	13	%	25.2	%	61.8
河北省	39	黑龙江省	11	重庆市	12
辽宁省	9	吉林省	5	四川省	31
浙江省	3	山西省	35	贵州省	48
福建省	8	安徽省	17	云南省	73
山东省	10	湖北省	25	西藏自治区	5
广东省	3	江西省	18	内蒙古自治区	31
海南省	5	湖南省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8
		河南省	28	陕西省	50
				甘肃省	41
				青海省	14
				宁夏回族自治区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5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与需求，如表 1-3 所示目前这种差距还在加大。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社会保障对象，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另外一部分人在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资

源条件非常贫乏的地方。另外，现阶段中国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即使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不稳定，很容易返贫。专家也特别提到，自然灾害也会引发或加剧贫困，这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难题。

表 1-3　1985-1999 年国内贫困县与全国平均农民收入差距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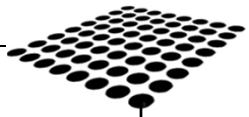
（单位：元）

	全国平均	贫困县平均	贫困县相当于全国平均的%
1985	397.60	206.00	51.81
1992	784.00	416.69	53.15
1993	992.00	483.70	48.76
1994	1221.00	648.30	53.10
1995	1577.70	823.90	52.22
1997	2090.10	1240.00	59.33
1998	2160.00	1318.00	61.02
1999	2210.00	1347.00	60.90

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反贫困政策，使中国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城市的反贫困政策主要是：第一，两个确保；第二，最低生活保障；第三，社区公共服务社；第四，小额贷款等等。以上种种说明，中国的城市反贫困政策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社区和非盈利机构为两翼，对城市贫困人口进行全面的援助。就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政策看，到 2000 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①]2001 年 5 月中央提出了“2001—2010 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10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回顾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的进展，分析 21 世纪初中国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措施预示着中国的农村扶贫即将走入一个新阶段。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对贫困和反贫困问题重要性认识的逐步加深，有理由相信，在 21 世纪反贫困政策会越来越健全和完善，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会使贫困问题逐步得

① 国务院新闻国办公室.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 中国扶贫网，2001. 6. 19



到缓解。显然，在贫苦与反贫困战略实施中，大众传播将会发挥无比重要的作用。

二、信息化差距：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直接问题

贫困和信息化差距联系十分紧密，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出版的《1999 年人文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9）的封面使人心惊。封面里说明其外圈为世界人口，扇形为各区域，中央暗色楔形为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Internet)使用者。它显示传播与沟通的技术整和趋势，也形象地显示了全球化下的不均匀性。互联网正在新的全球网络中将世人联系起来，但是网络却集中于富裕国家的人们之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19%，但却占使用者的 91%。联合国发展发展计划署指出，地理障碍可能已被传播与沟通所减低，但是新的障碍已经浮现，信息网普及全球，但却难以觉察地排除了其余的人。统计资料显示，至 1998 年，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4.7%,但却占了互联网使用人口的 26.3%;整个东亚人口占 22.2%，使用人口却只有 0.4%。另外，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中隐藏的更深问题还不是接近网络，而是使用的内容和质量。[①]

目前，正当人们还沉浸在数字化传播所带来的种种神话中时，“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严峻现实却已摆在我们面前。什么是“数字鸿沟”呢？“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它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简言之就是对信息的掌握、拥有、控制和使用能力上存在的差别。它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美国商务部 1999 年发布的《定义数字鸿沟》报告说，收入、教育和种族都是造成“数字鸿沟”的因素。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了差距，也就是“数字鸿沟”。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在开发、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意味着落后的国家、地区和人群面临着“知识贫困”和“信息贫困”，缺乏发展的能

① 曼纽尔·卡斯特.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第 1 卷），网络社会的崛起. 中文版译者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